

近思录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译注 刘凤泉

中国儒哲
十大名著

合撰

朱熹 吕祖谦

山东友谊出版社

近思录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译注 刘凤泉



合撰

朱熹 吕祖谦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思录/ (宋) 朱熹、吕祖谦合撰; 刘凤泉译注.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董治安, 张忠纲主编)

ISBN 7-80642-307-9

I. 近… II. ①朱…②吕…③刘… III. ①近思录
- 注释②近思录 - 译文 IV. B2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471 号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近 思 录

合撰 朱 熹 吕祖谦

译注 刘凤泉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4 插页 34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3000

ISBN 7-80642-307-9/I·67

全套定价: 256.00 元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编委会

主 编：董治安 张忠纲

副主编：董 时 刘凤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凤泉 牟瑞平 张茂华

张忠纲 朋 星 姚文瑞

鹿风芍 董 时 董治安



儒学，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儒家思想的精华。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儒哲十大名著》丛书。

从汗牛充栋的儒学典籍中，我们精选出儒学思想家的十部著名著作，加以译注。这十部著作作为《论语》、《孟子》、《荀子》、《春秋繁露》、《法言》、《近思录》、《朱子性理语类》、《象山语录》、《传习录》、《思问录》。这些著作在儒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从社会作用来看，它们都无疑是儒学著作的典范代表。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在注释过程中，编者态度严谨，付出了很大努力。首先，选择善本，对原文作了认真校勘；其次，尽可能吸收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力争做到注释详明，译语精当；此外，书前引言和篇前题解，撮其旨意，也颇能便利读者。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儒学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升温。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正在汇聚到世界现代文化的洪流中，这对全人类的

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相信，《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的出版，对于儒学进一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年12月



《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研读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深感其内容“广大闳博,若无津涯”,担心初学者不知如何入手,难以把握要义。于是,精选他们著作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编辑而成《近思录》。

—

理学产生于北宋中期,它是儒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复兴,它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为巩固封建统治提供了思想基础。

理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就社会根源而言,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为理学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北宋初期整顿伦理纲常为理学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唐宋之际,农民从士族门阀的直接人身控制中摆脱出来,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缓和了。这种社会变化促使统治阶级强化国家机器,建立一套新的哲学体系以有利于从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统一。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为了消除政权中的不稳定因素,恢复并发展封建秩序,整顿废弛已久的伦理纲常,成为重要的政治思想任务。而改造儒学使之更富于思辩色彩,将伦理纲常理论化,才能完成这样的政治思想任务。

就思想根源而言,唐中期儒学复兴是理学的前兆,长期的儒释道思想融合是理学的文化背景,而疑古惑经的风气则是理学产生的精神气候。唐代中期,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实质就是复兴儒学。他明确建立儒学的道统,提倡“性三品”的伦理观点,都为理学的形成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而长期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互相影响,为儒学从释道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料创造了便利的文化环境。儒学在借鉴和批判释道学说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新的思想体系。中唐以后,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疑古惑经的风气,这种风气打破了从前学者们固守师说,只在繁琐章句注疏中讨生活的顽习,人们敢于大胆对儒家经典提出怀疑和批判。宋儒舍传疑经,自由解经发挥义理,为理学的产生创造了适宜的精神气候。

理学是儒学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所以后人称之为新儒学。它既不像先秦儒学那样简单粗糙,也不像汉晋儒学那样神秘玄奥。它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更富于思辩性,哲理性。它从更高层次上把握了自然和人的关系,使儒学更加走向成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

理学仍然坚持孔孟之道伦理本位、道德中心的原则。他们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伦理关系中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培养出理想人格;只有道德完美的圣贤,才是理想人格的最高楷模。当然,理学是传统儒学的新发展,它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发展了传统儒学,大大地丰富了传统儒学,使儒学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首先,理学确立了儒学的宇宙论基础。理学家重视探讨本体论问题,即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他们否定了有上帝一类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并精心构筑了自己的宇宙本体论。他们将宇宙本体与伦理纲常相互联系起来,将伦理纲常的内容暗置于宇宙本体之中,使伦理形而上学化为宇宙本体,又使宇宙本体伦理化为道德准则,从而用宇宙论论证了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样,使儒学成为了哲理性很强的哲学思想体系。

其次,理学发展传统儒学的心性学说。理学家重视探讨人性来源和心、性、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主张人性根源于宇宙本体,人的本质和宇宙的普遍本质是一致的。如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概念,精密地论证了“天地之性”是最根本的人性。又从“气质之性”说明了人性善恶的来源,从而站在理学的观点上解决了儒家人性学说的历史难题。

再次,理学丰富了传统儒学的修养方法。理学家力求建立人生的最高理想,他们认为,这种最高的理想只能在日用人伦中通过自我认识和切实践履才能达到。因此,他们更强调修养的方法,强调理欲、义利之辩,强调格物致知、诚敬、知行等问题。通过具体的为学之方,实现理学自我实现的目的。

理学是儒学的成熟理论形态,是中国古代封建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高峰。它在理论内容的丰富,思想体系的完整,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它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人类认识史上也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二

理学又称道学。道学之名早于理学之名。南宋初,“道学”名称颇为流行,后来,“理学”名称才逐渐兴盛。北宋理学,多称道学,《宋史·道学传》便是沿袭了这一名称。

《道学传》阐述理学源流,并高度肯定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其云: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序、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

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周张二程同为北宋理学大宗，被称为北宋四子。他们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从而使儒学具备了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惇实，避英宗旧讳而改名。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谥元，称元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他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他的《太极图说》(本名《太极图易说》)批判地吸取了道家宇宙发生的理论，并把它和《易传》的宇宙理论结合起来，构成了理学的基本宇宙模式。他的《通书》(本名《易通》)对“诚”作了充分发挥，指出“诚”是人和宇宙本体的合一，通过“诚”的媒介，将宇宙论和道德论统一起来了。周敦颐的理论完全破除了汉学传统，开始重点探讨天道、心性、义理等精神哲学问题，形成了完整的理学理论体系。后人称其学说为濂学。

对于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有一个公允的评价。他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胡瑗)、徂徕(石介)卓乎有儒者之矩

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由此可见周敦颐对理学奠基创始的重要意义。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他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因久居陕西凤翔府郿县横渠镇讲学,学者多称他为横渠先生。他一生穷神研几,努力探索宇宙人生的奥秘。他的《正蒙》以《易传》为根据,论证了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建立了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体系,批判了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诬天地日月为幻妄”及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其中《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发挥了儒家传统的仁孝道德观念,展示了视万物无一物非我的大心境界,表达了调和阶级矛盾的兼爱思想。此外,张载还提出多方面的理论观点。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论,“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多识”“尽性”的修养途径,“复井田”的政治思想。总之,张载的理论超越了传统经学而向心性、义理等道德修养领域深入,建立起自己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学学派,从而使他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为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为伊川先生。二程祖居中山,后由开封徙至洛阳。他们早年受业于周敦颐,接受其道德性命之学的观点。但他们自称“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氏外书》卷十二)。他们利用《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提出理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形而上”之理是“所以阴阳者”。他们以“天理”为最高范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广招门徒,形成了庞大的洛学学派。

天理论是二程哲学的基石。所谓“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还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总和。任何事物皆有其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程氏遗书》卷十八)。程颐还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接触到了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天理论的内容。

二程重视人性问题,因为天理不配以良心,就不能落到实处。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性”作了区分。程颢分人性为二:一是“生之谓性”,即“气稟之性”;一是“天命之谓性”,即“天命之性”。程颐也分人性为二:一是性,或曰理性;一是才,或曰气质之性。二程对性的讲法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他们都主张性善说,以气稟的不同来说明人们善恶的形成,认为必须通过修养“变化气质”,从而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

二程特别重视“变化气质”的方法。程颢的修养方法以“识仁”为目标,通过“定性”“诚敬”,达到物我合一,浑然一体的圣人境界。程颐的修养方法以“与理为一”为目标,通过“用敬”“致知”,明天理而穷物理,进而成为圣人。

二程理论对传统儒学分析阐发,融会贯通,并且批判地吸取了释道二家的理论成果,从而构建了一个哲理化、思辩性的新儒学体系,最终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二程理论大同而又有微殊,实开南宋理学内部“理学”和“心学”两大派系之先河。南宋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路线,综合二程周张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就是程朱理学。到了南宋后期,程朱理学逐步上升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成为官方哲学。从此,它在封建社会的思想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对封建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

《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为初学者把握北宋四子的思想理论而编辑的理学基础读本。书名取《论语·宪问》“切问而近思”的意思。朱熹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〇五)吕祖谦也说:本书切近“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近思录〉跋》)可见,从《近思录》入门,循序渐进,便可登入理学殿堂。

朱熹、吕祖谦摘录周张二程著作语录分类编排，基本上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和范围。《朱子语类》卷一〇五云：“《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这样编排完全符合理学思想体系。

《近思录》融汇北宋四子的理学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篇之间意脉清晰，弥补了各家各派散而难举的缺陷。书中先谈有关宇宙生成的本体论。卷首收录四子关于“道”为世界本体和“性”的本原的论述，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次谈“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为学要“尊德性而道问学”，读书须“致知而穷理”，由浅入深，示人门径。再谈立身处世的修养论。道德存养的功夫贯穿于知行之中，以存养为基础，推己及人，修身齐家则可以出仕，进而治国平天下，全面概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学说。最后谈教学，辨异端，明道统，在引导辨析的基础上，推出了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圣贤气象。

全书从分析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开始，循着格物而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然后批评异端以明圣贤道统，全面地阐述了理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近思录》融濂学、关学、洛学于一炉，确立了以二程为中心的理学学统。这一学统在南宋后期得到官方的确认。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下诏云：“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道命录》卷十）

《近思录》内容切身，语言平易，为人们学习理学提供了入门的

阶梯,纠正了“厌卑近而骛高远”的偏失,为传播理学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江永称《近思录》,“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近思录集注·自序》)。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明诸儒,若何氏基,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由此可见《近思录》在理学传播方面的重要意义。

《近思录》问世以来,流布极广,刊刻注解,层出不穷。通行的刻本有宋淳祐十二年(1252)叶采《近思录集解》本,明正德十四年(1519)汪伟刻本,清康熙中御儿吕氏宝浩堂刻《朱子遗书》本,同治五年(1866)福州正谊书院《正谊堂全书》本。对《近思录》的注解,先有朱熹自注散见于《朱文公文集》《四书或问》《朱子语类》中,尚未成书。重要注本有叶采《近思录集解》、清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清江永《近思录集注》。其中,叶氏积三十年之功成此一书,用功颇深,影响很大。江氏但以朱熹语录注解四子,思想演进脉络分明,颇便后学。

在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封建时代,《近思录》一书可谓家喻户晓,久盛不衰。时至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理学的陈腐和保守便越来越明显了。在“五四”运动中,理学受到了全面的批判,从神圣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而《近思录》也就褪去了昔日的荣光,不被人们所重视了。

然而,理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成熟的理论形态,代表了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汲取这些精华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是有益的滋养。所以,我们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思想文化,对于理学也不例外。只有认真研究,深入分析理学的利弊得失,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宏扬传统优秀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译注《近思录》一书,正是为了人们理解理学,借鉴理学中的有益因素提供便利条件。本书以江永集注本为底本,并以叶采集解本校勘,订正了江本中的个别错讹。注释尽量做到寻本究源,通俗

易懂。译文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力求信达。每卷之前撰有题解,撮其大意,有利读者理解。书后附录相关材料,方便读者查阅。由于编著者水平所限,加之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多,书中有疏误之处,还希望读者朋友不吝指出。

目 录



引言	/ 001 /
卷一 道体	/ 001 /
卷二 为学大要	/ 037 /
卷三 格物穷理	/ 105 /
卷四 存养	/ 155 /
卷五 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	/ 195 /
卷六 齐家之道	/ 221 /
卷七 出处进退 辞受之义	/ 239 /
卷八 治国平天下之道	/ 267 /
卷九 制度	/ 291 /
卷十 处事之方	/ 315 /
卷十一 教学之道	/ 353 /

卷十二 改过及人心疵病 / 369 /

卷十三 异端之学 / 387 /

卷十四 圣贤气象 / 403 /

附录

朱熹、吕祖谦论《近思录》 / 425 /

周敦颐传 / 431 /

张载传 / 433 /

程颢传 / 435 /

程颐传 / 439 /